

菲律賓共產黨與中共之關係

陳鴻瑜

(本文係作者參加今年四月六日在臺北舉行之「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所提專題報告。——編者)

壹、菲律賓共產黨之起源

菲律賓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一九二〇年代農民不滿與農村不安的產物。一九二四年，在美國人詹尼奎特 (William Janquette) 之邀請下，菲律賓工會派了五名代表出席在廣州舉行的「第一屆東方運輸工人會議」(First Congress of the Oriental Transportation Workers)。一九二五年，菲律賓勞工協會 (Philippine Labor Congress) 亦派代表出席在廣州舉行的「紅色職工國際」(Red 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次年，菲律賓勞工協會決議加入「紅色職工國際」。一九二八年，共產主義者伊凡吉利斯塔 (Crisanto Evangelista) 組勞工黨 (Workers' Party)，隨後他到上海出席中共的會議，並會見周恩來。然後他轉赴莫斯科，接受訓練^①。

伊凡吉利斯塔返菲後，向菲律賓勞工協會報告獲准加入「紅色職工國際」的詳情，結果引起政府、輿論之反對，勞工黨內亦發生歧見，他遂在一九二九年五月退出，另組菲律賓勞動者協會 (Congress of Philippine Workingman)。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他正式組織菲律賓共產黨 (Partido Komunista of the Philippines, PKP)，走親莫斯科路線^②。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在「第三國際」發佈組織「聯合陣線」以對抗法西斯主義之訓令下，菲律賓共產黨與合法的菲律賓社會主義黨 (Social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合併，但仍保持其完整的組織，其策略是藉滲透社會主義黨來

註① Alvin H. Scaff, *The Philippine Answer to Commun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55, pp. 9-11.
註② Alexander der Turp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of the Ageing New Society," *Conflict Studies*, 1984, No. 165, p. 6.

擴展本身的力量，以社會主義黨之名義來掩護其行動^③。一九四二年三月，即在日軍占領馬尼拉二個月後，由共黨份子路易斯·塔洛克 (Luis Tarus) 召集抗日領袖，在丹轆 (Tarlac)、邦邦牙 (Pampanga) 和新伊茲哈 (Nueva Ecija) 三省交界處的中呂宋地區集會，組織「人民抗日軍」(Hukbalahap)，此即一般通稱的「虎克黨」。一九四五年十月後，虎克黨易名為「人民解放軍」(Hukbong Magpapalaya ng Bayan, HMB)。

當一九五〇年代初麥格塞塞 (Ramon Magsaysay) 任國防部長時，採取積極的剿共政策，致「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逐漸失利及喪失人民之支持。菲共轉而採取溫和漸進的策略，新上任的菲共總書記吉薩斯·拉瓦 (Jesus Lava) 主張以議會鬭爭的方式取得政權。但此一路線却激起年輕共黨份子的不滿，如「民族主義青年」(Nationalist Youth) 主席施順 (Jose Maria Sison) 在一九六七年起草一份稱為「糾正黨的錯誤及重建黨組織」(Rectify Errors and Rebuild the Party) 的報告，批評黨的路線錯誤。一九六七年四月，菲共舉行擴大中央委員會會議，施順等激進派因受到整肅而自行組織臨時政治局。施順在一九六七年五一勞動節發佈第一道公開聲明，讚揚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譴責劉少奇和蘇聯，及把拉瓦派系稱為菲律賓現代修正主義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施順等十一名年輕菲共份子在邦加絲蘭 (Pangasinan) 省(另一說在丹轆省)的鄉下正式成立馬列派菲共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主張在馬列毛思想之領導下重建黨組織，並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法，將戰場擴展到中呂宋以外廣大的農村地區。

依馬列派菲共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其與舊菲共之分裂，與中蘇共分裂並無直接關係，而是黨內激進份子因不滿黨的政策而另組黨中央，致發生分裂。不過，雙方確實存在著親中共和親蘇聯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舊菲共在一九六六年曾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在一九七〇年公開批評毛澤東思想和馬列派菲共，而仍舊支持蘇聯的路線。

貳、馬列派菲共與中共之歷史關係

早期菲共與中共之關係並不密切，中共未給予重視或提供物質支援，菲共也從未接受中共之領導。菲共的情況與馬共和泰共

註③ David A. Rosenberg, "Communism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III, No. 5, September, October 1984, p. p. 24-26

十分不同，馬共和泰共乃係直接受中共扶助而成立的。中共所以未注意菲共，原因有二，一是菲律賓距離大陸遠，二是中共把注意力集中在泰國和馬來半島。

在一九六〇年代初，菲共和印尼共黨保持密切關係，如施順在一九六二年應邀訪印，他返菲後，在一九六三年成立「菲印友好文化協會」(Philippine-Indonesia Friendship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一九六三年六月，他成爲親印尼的《進步評論》(Progressive Review)之編輯，並接受印尼駐菲大使館之津貼。直至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共政變失敗後，菲共因失去印共之支援，施順纔轉向北平尋求指導與支持^④。

此後，菲政府及傳播媒體即陸續出現各種有關中共支援菲共的報導。如一九六五年五月，菲律賓參議院移民委員會指出，「中共特別著重在吉柯爾地區，推進秘密軍事訓練，過去的『華支』游擊份子，業已恢復活動」。九月，菲律賓軍事情報當局更指出，中共已與菲共進行合作，並在香港搜購大量菲幣，秘密交付航行呂宋之大武士輪(Delos)運往小呂宋，資助菲共。此外，中共亦派十名軍事人員到呂宋南部的畢科爾(Bicol)和米賽亞(Visaya)的秘密訓練中心，主持對菲共訓練事宜^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共開始以菲律賓國語「達加洛」語(Tagalog)對菲律賓廣播，每週十小時半。一九六六年，菲政府解除前往共黨國家旅行之禁令，有許多非國記者、學者、政客開始應邀訪問大陸。九月十日，馬可仕總統在國家廣播公司(NBC)的「會見新聞界」節目上表示，中共援助菲共。菲官方公報亦指控中共派軍事人員滲透到菲島，訓練當地共黨份子，而且還從中國大陸運進偽造菲幣^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邀請施順等九名左傾青年與學生代表至大陸訪問。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中共「人民外交學會」邀請「菲律賓促進民族主義運動」(the Movement for Advancement of Nationalism)總書記施順及該組織在民答那峨地區的負責人米拉里·林(Milario A. Lim)訪問大陸。隨後，亦有毛派份子亞瑟·賈西亞(Arthur Garcia)和尼洛·塔雅各(Nilo Tayag)應邀訪問大陸^⑦。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新華社」曾經報導菲共堅持武裝鬪爭路線在呂宋島獲得勝利的消息，此項消息之發佈，顯然與施順訪問大陸有關。五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野火燒不盡〉的文章，煽動「菲律賓革命人民，只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

④ Jay Tayl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4, p. 322.

⑤ 《共匪對亞非地區各國滲透顛覆活動概況》，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編印，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出版，第一一～一二頁。

⑥ Jay Taylor, *op. cit.*, p. 324.

⑦ *Ibid.*, p. 326.

來，走人民戰爭的道路，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經過長期的艱苦鬪爭，就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⑥。

施順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脫離舊菲共，另組親北平的馬列派菲共，以毛澤東思想做為指導綱領。但在此一時期，菲律賓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有轉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馬可仕總統表示，一旦美國撤出亞洲，則菲國有必要與中共進行某種安排。菲國外長羅慕洛 (Carlos Romulo) 亦認為與中共改善關係不會危及菲律賓，他甚至歡迎中共加入亞太理事會 (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共紅十字會捐八萬三千美元救助菲國水災。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在二十四小時內歸返遭劫持的非國民航機。在中共與美國進行兵兵外交及美國解除對中共的貿易禁運後，馬可仕總統允許非官方的三十人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共，並獲周恩來接待。一九七一年五月，馬可仕在一次記者會上表示，將重新研究菲國對中共在聯大席位之立場，同時表示，他不相信中共會輸出革命及控制亞洲^⑦。

儘管菲政府與中共的關係逐漸在改善，但似乎沒有影響「新人民軍」的活動。從一九七〇年初開始，菲共連續在馬尼拉發動反政府的示威遊行，在鄉間進行伏襲政府軍的游擊活動。一九七二年七月初，有一艘名叫卡拉加坦 (Karagatan) 號的船運送武器和裝備在伊沙貝拉 (Isabela) 省的狄高佛 (Digo) 港被查獲，菲安全單位表示船貨是來自外國，而最可能是來自中共。由於菲共叛亂活動升高，馬可仕乃在九月二十一日宣佈戒嚴統治，據估計當時「新人民軍」兵力已達一萬人，同情者有十萬人，菲政府指控中共與菲共企圖推翻政府之活動有關連^⑧。

新聞報導中有關中共最近一次提供援助給馬列派菲共的時間，是馬可仕總統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前往北平之前。美國警方逮捕一名美籍菲人桑瓊安小姐 (San Juan)，她從加拿大入境美國，攜帶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準備轉交給在美國的馬列派菲共人員的經費七萬七千美元，她因未向海關申報而被逮捕^⑨。

叁、未來發展

從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以後，有關中共援助菲共之消息，幾乎很少見諸傳播媒體，反應出該一時期中共與菲共之關係已趨於冷淡。考其原因有四：第一，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繼之被整肅，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路線」取代了「毛思想路線」，而馬列派

註⑥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第四版。

註⑦ Jay Taylor, *op. cit.*, 347.

註⑧ *Ibid.*, p. 349.

註⑨ Tiltman Durdin, "Philippine Commun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76, Vol. XXV, pp. 40-48.

非共還堅持「毛思想路線」，自與鄧小平的路線有異。第二，中共自一九七一年後與美國進行「和解」，甚至在蘇聯使用越南基地後還表示支持美國使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此與非共堅持美軍撤出非國基地的主張不合。第三，一九七五年六月，馬可仕總統訪問中共，雙方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共把發展「政府與政府」間關係放在首位。第四，非共份子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漸抬頭，不願被稱為毛派份子，而有「非化」或「本土化」之態度傾向，如馬列派非共主張支持紅高棉共黨(Khmer Rouge)以自力方式對抗越南^⑭。

另據最近的報導稱，馬列派非共有轉向蘇聯尋求援助之迹象，如一九八二年有一位投奔自由的蘇聯情報人員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他曾負責把資金轉交給馬列派非共；另一項證據是，菲律賓軍方在納卯市(Davao)逮捕一名東德人，蒐獲的文件中知道馬列派非共曾透過其「國際聯絡委員會」(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與幕後由蘇聯支持的國際機構進行接觸。因此非國軍事當局相信馬列派非共之宣傳經費的百分之八十，係來自蘇聯支持的國際機構，而且還指出蘇聯利用荷蘭和西德的人道組織提供資金給馬列派非共^⑮。證據之三是蘇聯曾透過某一東歐國家，經南葉門港口以船運軍火給新人民軍^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份提供給美國參議院特別情報委員會的報告說，蘇聯正透過擴充在馬尼拉的大使館和透過工會組織，以與非共顛覆份子取得間接聯繫及提供各項援助^⑰。

惟有些報導，則認為馬列派非共未曾獲得中共、蘇聯、越南、古巴或其他共黨國家之援助，原因是它純為一個地方性的叛亂活動^⑱，以及由於非國地理之孤立性^⑲，致使馬列派非共無法取得外援。非共既無外援，其經費與武器從何而來呢？大體上，非共之經費與武器來源有三：一是從伏襲政府軍、民兵和自衛隊而擄獲的武器；二是徵收「革命稅」，稅率視對象之貧富程度而不同^⑳；三是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合作，由非共訓練回民游擊隊，而由「摩洛民族解

註⑭ Guy Sacerdoti and Ian Burma, "From Huks and Maoists into a 'Filipinised' Par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30, No. 46, November 21, 1985, pp. 56-57.

註⑮ Leif Rosenberger, "Philippines," in Richard F. Staar (ed.), *198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 228-232.

註⑯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第二十九頁；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第十六頁。

註⑰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第二十九頁。

註⑱ 關於非共未接受其他共黨國家之援助的評論，可參見 Guy Sacerdoti and Philip Bowring, "Marx, Mao and Marco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30, No. 46, November 21, 1985, pp. 52-57.

註⑲ "No. 1 - Deterioration Marked, Widespread and Demonstrable," *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September 1985, pp. 10-13.

註⑳ "Philippines," in Richard F. Staar (ed.), *1984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266-274.

放陣線」提供援助做爲交換條件¹⁹。

中共從一九六〇年代末以後，採取「政府與政府」及「黨與黨」二分法政策²⁰，也就是中共在極力推展與各國政府之正式外交關係之餘，仍不忘記維持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與當地共黨的友好關係，這是至今中共對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和菲律賓所持的態度。儘管中共領袖及前駐菲「大使」莫燕忠一再否認中共與馬列派非共有任何關連，強調中共不干涉各國的「革命」，因爲革命是「各國內部事務」²¹，但是從中共領袖一再主張中共與東南亞各國共黨維持「道義」關係之立場來看²²，很顯然中共尙未放棄其利用當地共黨之企圖。在二分法政策下，中共仍將與馬列派非共維持著「道義」關係。

註¹⁹ Leif Rosenberger, *op. cit.*

註²⁰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D. C. Heath and Company, Lexington, 1971, pp. 164-167.

註²¹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

註²²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第六版。趙紫陽在馬尼拉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我們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發生關係，遠在和這些國家建交以前。

我們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只是政治上、道義上的關係。各國的共產黨純粹是這些國家的內部問題。各國如何處理，是它們自己的問題，我們不加干涉。我們對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也不干預。」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新聞發言人吳興唐，在新聞發布會上答覆有關中共與非共的關係問題，他說：「中共同非共的關係同其他共產黨的關係一樣是道義上的關係。對菲律賓共產黨的政策，中共不做評價，因爲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第一版。）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

*

*